

[德]汉斯-约阿希姆·马茨 | 著

徐 珺 | 译 朱小安 赵远红 | 译校

Der Gefühlsstau

Ein Psychogramm der DDR

情感堵塞

民主德国的心理转型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德]汉斯-约阿希姆·马茨 | 著
徐 珺 | 译 朱小安 赵远红 | 译校

情感堵塞

民主德国的心理转型



Der Gefühlsstau

Ein Psychogramm der DDR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Der Gefühlsstau: Ein Psychogramm der DDR

by Hans - Joachim Maaz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作者授权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感堵塞: 民主德国的心理转型 / (德) 马茨著; 徐珺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 - 7 - 5117 - 1766 - 5

I. ①情…

II. ①马… ②徐…

III. ①精神疗法

IV. ①R749.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2234 号

情感堵塞: 民主德国的心理转型

出 版 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贾宇琰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75(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52612332(网络销售)
(010)66130345(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home.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溢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 184 千字

印 张 14.75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献给那些致力于心理革命的人们

目 录

Contents

●● “现实社会主义” 是压制性体系

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	3
国家压制.....	8
党的领导地位	10
国家安全局的权力	11
司法压制	15
国家教育的压制	17
家庭压制	23
医学界的压制	31
分娩过程中的权威专制	37
教会压制	39
总 结	43

●● 压制的后果

缺陷综合症与情感堵塞	47
------------------	----



内在的缺陷状态	50
外在的缺陷状态	54
缺陷综合症后果	57
自然天性的疏离	58
被阻碍的情感	61
人格分裂	65

用代偿消除缺陷综合症的尝试

作为代偿的普遍生活方式	71
性格的扭曲	84
阻碍型性格	85
强迫型性格	87
社会角色作为可能的代偿	90
当权者	92
野心家	103
追随者	106
反对派	108
出境者和叛逃者	111
空想家	120

“转折”期心理

社会心理的前提	125
情势的危机	130
从心理角度看“和平革命”的过程	132

独立的民主化道路的失败·····	137
边境开放——“德国迅速成为祖国”·····	139
对选举结果的心理阐释·····	143
“转折”的心理后果·····	147
对“非暴力”问题的补充·····	151

●● 两德统一的社会心理学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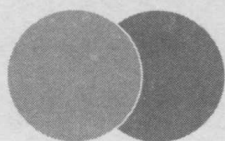
德国分裂的心理学意义·····	159
统一进程作为心理防御过程·····	164
两德统一的心理学危险·····	166

●● 为“心理革命”服务的心理治疗法

在“适应疗法”和“改变疗法”之间的东德心理疗法·····	179
我们的治疗实践·····	187

●● “心理治疗文化”

共同生活的文化·····	199
自然分娩·····	203
用陪伴替代教育·····	205
整体医学·····	207
反对权威宗教·····	210
结语·····	213
关于我·····	215



“现实社会主义” 是压制性体系

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

民主德国存在了40年。近些年来，我们的社会制度普遍被称为“现实的社会主义”，这一称谓本身就已不自觉地加盖了“某种思想业已衰败”的印章。生存的现实与当年所宣扬的理想已经相去甚远，这一点越来越不可否认。“以现实为原则”的这一心理分析术语在当年是那样被嘲弄和不屑一顾，而如今我们必须使用这一原则才能差不多阐释清楚，“享乐原则”在东德时期是如何被大大束缚的这一现象。那时，面对每一次批判性的质询，政府都假借未来糊弄人：什么“我们当前面临这样那样的困难，虽然与贫穷有关，但只是临时的，我们原则上一定可以克服”；或者强词夺理地说“大部分困难是由于国际封锁和自然环境所造成，也有的纯粹就是历史遗留的问题”，等等，最后重复的是陈词滥调：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想，其真理性和正确性是坚不可摧的，我们必须坚定地一往无前，“社会主义的胜利”指日可待。

整个民主德国犹如一座伪宗教膜拜的恢弘庙宇：敬神般的个人崇拜，“领袖圣像”及领袖语录，诸多仪轨，大规模群众活动，起誓表决心，严格的道德要求和戒律，一切都由宣传部门及党代表们用神甫般的庄严进行管理。

在东德政治官僚权力崩溃之后，又有人迅速拣起“斯大林主义”这一概念，用来解释和遮蔽某些事实以逃避真相。他们的借口是，共产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构成同一幻想的正反两面，一边是共产主义，不断对美好未来发出空头许诺，另一边是斯大林主义，一部在外国早已翻篇的历史，而这一切与我们现时的人，此时此地生活着的人，没有



任何关系。我们的贫穷，我们的困苦，我们的负罪感和我们的软弱无力，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发生，因为我们既没有获得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斯大林造成的噩梦也早已终结。但既然顶着“斯大林主义”的帽子，也是需要抓出一些人，即所谓真正的斯大林主义者，为一系列成堆的复杂问题负责任，将他们公开地进行一下公审和判决。于是，首先是昂纳克^①，之后是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德国统一社会党。他们被拎出来当作整场灾难的罪魁祸首。

1945 年就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当几个纳粹分子和战争罪犯被点名、审判或是被驱逐之后，罪恶似乎就这样被驱除了，好像所有的美好都会伴随着“零时刻”在我们身边繁荣馥郁起来。而民主德国确实把这一荒谬的想法变成了其“反法西斯”思想和精神的基础。当时有一个观点被反复地向人们灌输：在东德已经通过法律彻底消灭了纳粹主义。这完全是对社会心理和性格之间关联的彻底无知。不论是号称所谓的“去纳粹化”还是宣告斯大林主义时代已经终结，其主要目的都是想掩盖一个事实，即绝大多数东德人在当时和现在都是群情激昂的施害者，或者至少是自觉自愿的跟随者。在每个人都但求自保的事实上，历史又再次重演：几乎所有的人都声称自己根本不知情，未曾参与其中，也不认为自己应为此负责并承担罪责。

身处转型期的民主德国，将“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心理防御机制，目的是想遮蔽一个事实，即：全体东德人民的生活方式已严重失常，其范围不仅囿于政治和社会领域，也波及到科研、经济、法律、艺术、教育，直至人际交往、日常文化等各个社会层面，更重要的是对个体心理结构也产生了影响。笔者在本书中意欲阐明，尽管当时每个个人无法完全逃离这个变形的制度，但面对压迫性暴力时，仍

^① 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1912—1994），前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也是最后一位正式的东德领导人。——译者注

然有不同的反应，还是有人为了自由奋力而为。对于他们的举动能够、也必须给予道德上的高度评价。同时我也希望，本书能够揭示所有受到牵连的人，不论是受害者还是施害者，能对自身进行反思，不再被某些人偷换概念的哄骗所左右。

“斯大林主义”这个词曾在一夜之间风靡起来。这是那些施害者首先试图在语言上来洗清自己的罪行。他们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纳入受害者行列，好像我们再次成为一个充满“抵抗者”的民族。他们没有一个人不在盘算，只要党政机关中牺牲个把领导，便能把长久郁积下来的极权专制问题统统解决掉。如此一来，就可遮盖住党政国家机关人员那些追名逐利、机会主义、道德败坏的勾当，所有罪责就可以一笔勾销。对于那些“反对共产党的人”而言，现在终于天下大白：社会主义是彻头彻尾的一种刑事犯罪，是一种社会的畸形发展；最后是占多数的随大流的人，他们无不感觉自己是被欺哄的可怜受害者。然而当事实的真相被源源不断揭露出来后，招来的却是许多人的怨怼和愤恨，看来是因遮盖羞耻感、罪责以及无法承受的自卑感不成而恼羞成怒。

暴力，是“现实社会主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条准则：首先是公开和直接的暴力，表现为谋杀、刑讯、枪击命令、监禁和开除国籍，其次是间接和隐形的暴力，表现为法律的不确定性、报复打压、恐吓、羞辱、教条灌输以及一系列的威逼、胁迫和恐惧。冷酷的极权专制统治体系被轻而易举地换成了“民主集中制”，这种体系犹如一条单行道，永远是自上而下地传达着政策和决定，而自下而上的一边却关闭不通。“共同决策、共同建设、共同治理”的口号是个绝大的讽刺，因为来自底层的每项提议不仅不起作用，而且几乎都被自动贴上了捣乱、煽动、“空想改良世界”（个人的识见能比万能的党还要丰富吗？）的标签。因此，心怀革新主动性和创造力的人不仅会四处碰壁，还经常遭到污蔑、教训和恐吓。



长期的纪律教育、宣传蛊惑以及不容任何异见的偏狭做法，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将外在的强制力转化为内在的压抑。这一体系会长久地向个体施加影响，直至个体在心理机制上最后彻底完成自我奴化的过程，完成自我破坏的转化。可以想象，整个过程异常恶劣和严酷，因为个体到最后不仅无法感知其自我异化，不能辨认其真正的生活，而且还将其失常的行为主动合理化：比如这是在为“伟大理想”服务，是爱国义务，是为了保护祖国，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当然也是为了人民的福祉。当我们的“英雄”为自身的精神扭曲而感谢党和政府，并将其心理痛苦解释为隐忍的英雄行为时，真让人无言以对。在私人生活领域中，也有一套充分的“自我辩解”：目的是为了不危害家庭和顾及孩子，或者是为了逆境求生，还有个人无法改变现实等等。不仅连体育、艺术和科学都被迫纳入社会主义文化，这些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也将已经异化了的现象严加遮盖。

最厚颜无耻的是，许多德国统一社会党人也抓住“斯大林主义”作为自己的心理防御机制。当初，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加入党派或是为了升迁发迹，或是因为内心缺乏稳定性。这些缺乏自我的人想要借助严密的意识形态和空头愿景，来缓解自己的不安情绪和自卑感。然而，党作为“麻醉剂”的此项功能早就日渐衰微，只有少数得志者随着“剂量的加大”（党内升迁），尚能勉强获得心理抵偿并继续自我麻醉。因此很多人揭发自己真心拥戴过的、英雄般的领袖，以为这些貌似可被接受和解释的可靠证据，能够为自己下贼船进行辩护。如果现实不是如此残酷，这种急不可待的做法太令人耻笑。他们必须否认一切，否认自己对伟大理想的背弃和对全体民众的歪曲，否认对神圣的亵渎，否认对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的破坏，为此，他们必须摆出一副急不可待的激愤模样，这胜过需要那些过于人性化的非法敛财，和在贫穷的万德利茨区中鄙俗的“奢华”生活。两德统一后，德国统一社会党向民主社会主义党民主社会主义党，德国左翼政党，前身

是德国统一社会党。1990年2月，民主德国的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正式更名为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宣布该党为社会主义政党，目标为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放弃了“先锋队”、“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党内存在不同派别。——译者注的转变，可以作为警示性范例载入德国历史，它暴露了在逃避对国内困境、政治失误和权力斗争的责任时，人们所表现出的幼稚、毫无尊严和有害的人格缺陷。

“现实社会主义”确实存在了40年：在这40年中，百分之九十九的民众参与过选举闹剧，数百万人定期参加各类庆典大阅兵，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曾是少年先锋队，也曾是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成员，我们参加过社会主义的成年礼，也在自由德国工会联盟中出卖过自己的利益。50多万人曾参与过国家安全局那些令人不齿的监视活动。没有一个人敢说，他没有参与过对我们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没有看过城市的衰落，没有听到过媒体和官方消息中恶意的谎言，没有高呼过那些愚不可及的标语和口号，没有经历过道德的堕落，没有做过因贪腐、刺探、告发、阿谀逢迎当权者而导致的人们关系的破坏。对这一切居然可以保持沉默和容忍，可以装作视而不见，光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是多么明显的病态。

当我们现在谈论“斯大林主义”时，指的就是我们人民的生活方式，就是此时此刻我们所有的人。在我看来，我们并不能单纯地以为，只有我们受到一个不公正体制的压迫、欺骗和折磨，这有一定的道理，但遗憾的是，这个国家同时也是我们心理结构的一个映像，是我们内心那些不自知、或不肯承认的东西的外在写照。没有台下俯首帖耳、列队行进的人民，也就没有人能自己雄霸主席台。用一句精神疗法的讽刺来说：什么人养什么鸟——什么样的人民养什么样的政府！



国家压制

民主德国——象征着一种图圈般的生存方式。柏林墙、铁丝网和射杀令构成一道围障，目的是保证围障内的一切现行体制顺畅无阻：压制性的教育体制，覆盖全社会生活的专制体制，恐吓性的国安局，旨在镇压人民的一套奖惩机制（虽然陈腐空洞，却极为有效）。由此可以看出，国家的压制手段涉及到生存，心理及道德等诸多层面，会使社会的大多数人的心理遗留下严重的创伤。不过，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抗议和改革愿望，都会遭到强烈的暴力镇压，有例为证：1953年6月17日在民主德国；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每一次的血腥暴力事件使整个国家一再地陷入弥漫的恐慌和绝望之中。而这些悲观情绪正是形成社会的狭窄心理和性格扭曲的背景。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几十年中，所有的缺陷只能靠外来的强大，即苏联的装甲车队，来支撑和平衡。因而，东德人不能希望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解放，或者依靠自己使体制自由化。拒绝麻木不仁，拒绝在危险的抗议中失败，就意味着无法在这个国家安身立命。

当初，民主德国是在一片狼藉中建立而成：法西斯发动的疯狂战争，给德国民众带来不堪忍受的负罪感，因为上百万人被残酷地屠杀，因为死亡、监狱和伤痛给千万个家庭带来的不幸；而遭到毁灭的城市由于大量的战争赔款而无力开始战后重建；此外还面临着在外国强权（战胜国苏联）掌控下的生存方式。尚未开国，问题已堆积如山：负罪感，耻辱，委屈，伤害和异化。这些压抑的心理从未得到过梳理，甚至再没有被提起。可以想见，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基础就是压制及其心理投射。于是，反法西斯的传统大旗被挥舞起来，马

列主义的世界观也被提到一种信仰的高度，根据是具有不容置疑的科学性。当初新上台的领袖自以为，光靠所谓的“反法西斯”的旗帜和公开宣扬的政治口号，还有新创立的法律框架，应该足以确保开创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足以杜绝人们头脑中原来根深蒂固的思想。

“反法西斯”在官方场合自然不容质疑，其背后的心理动机也被隐藏起来。“反法西斯”在东德的新领袖看来，不用证实，即是一种更为成熟更为健康的人性化的举动，十分适合新领导。但是，如果称它有可能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新变种，便会被视为荒谬。可以肯定的是，东德从新政权建立起，尽管打着反法西斯的旗帜，但靠的是欺骗、虚假选举、暴力和外国的军事统治。

独裁专制，正是东德新掌权者的心理缺陷表现在政治上的诉求。他们一系列的强制性限制渗入到东德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屈从，口头的表态，参加各种集会，活动，倡议，比赛和节日庆典，加入各种大型团体组织，接受诸多的标语口号，忍受被歪曲的真相。任何形式的抵抗都会被有系统有计划地扼杀。对付孩子的手段，是教训、羞辱、孤立和疏远。对付成人的手段，则是劝阻、恐吓和惩罚。在这个社会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保证每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即真实的生存，自由表达意见，接纳和承认独特的个性和性格。所以，如果想要获得结社、高等教育、被提升、被认可的权利，必须在国家划定的准则内循规蹈矩，恭顺服从。如果想获得住房、旅行、嘉奖和事业发展等特权，必须会溜须拍马和绝对顺从。

在这种制度内，只有屈从的人能够马马虎虎生存下去，换句话说，就是消磨掉自己的朝气、坦率、真诚和批评的能力，从而换来一种不甚危险的平静生活。如果野心勃勃，想出人头地，那必须选择“与狼共鸣”，以失去个人的道德尊严和完整的人性作为代价。



党的领导地位

“现实社会主义”，这不过是政治官僚为自己的专制寻找的一个借口罢了。实际上，等级森严的专制统治掌控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自上而下，形成一套独有的管理体系以及发送指令的系统。德国统一社会党靠着全面的军事化管理独揽着大权。为了让人们服从管理，它一边挥舞着“党纪”的幌子，一边借助道德和心理学来施行高压手段。他们所谓的讨论和发言，实际上是传达贯彻领导指示。一旦有人敢于发表不同的主张或意见，立即会被找去“做工作”，不承认错误绝不罢休。也有人会坚持己见，那就不可避免地会遭受到党内审判，甚至开除党籍。这些人从此只能从事卑微的工作，并且被排挤在一切其他社会活动之外。为了确保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绝对统治，所有的领导岗位几乎都被党员占据。也有少数一些领导岗位被分配给“联盟党派”的代表，但是那不过是为了装装门面，而且那些被任职的民主党派的代表，必须首先承认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地位。无党派人士出任领导的事情几乎少之又少，如果有，也必须确保任职的人士绝对与党进行合作的政治态度。

为权力机构挑选干部的工作首先从出身开始：最初，有优先权的是工人农民子弟、之后逐渐增加了官员的后代，即干部子弟、军人子弟以及国安局干部子弟。一目了然，最早通过父母进行共产主义的洗脑教育成为培养干部最重要的基础。由于这些家庭实际上生活在同一种社会类型的区域中，所以保证了后代们纯正的单一性。这些家庭不允许各种形形色色的思想进入，什么古典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基督教的，或者人文科学的与哲学的经典思想，等等，即使有也会被大